



瞿白音和新中国剧社的往事

□ 吕伟彬

新中国剧社创建于1941年,实际上只活动了7个年头,那7个年头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中度过的最艰苦的年头。剧社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斗争,其经历之崎岖艰辛,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它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主动宣告解散。

当年新中国剧社用过的社徽是一匹象征任重道远的骆驼。剧社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以及瞿白音等。

瞿白音于1910年4月8日出生于原江苏省嘉定县(今改属上海市),小名昆昆,学名瞿金驹。他的祖父长期地处北方,是位很有学问却不求闻达的名士,京剧大师梅兰芳刚出道时,曾受到过这位老先生的热烈赞赏。瞿白音其母早逝,父亲名瞿顺卿。瞿白音是长子,下面还有个兄弟叫瞿金燕。

瞿白音也是书香门第,但在嘉定无恒产,瞿白音自小即养于王姓外家。他那低微的地位和清苦的生活,使他开始窥见了旧社会的丑恶本相。1931年初,瞿白音与年龄相仿的好友葛正济(即至今尚健在的戏剧家、翻译家葛一虹)、同辈亲戚查良镛(后以田鲁为别名,蜚声于影剧界)等组织了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编印了一些油印小报。不久又组成了暴风雨剧社,他们还联合了上海骆驼剧团的陈鲤庭、苏薇、左明等人,连续在嘉定县城内孔庙的明伦堂上日夜演出,所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帝国主义狂舞》《到前线去》等,大部分是活报剧,收得的票款,悉数捐赠东北抗日义勇军。

通过这些活动,瞿白音专业素养得到极大提升,还与已向专业化的剧人

赵丹、顾而已、王为一等结为好友,他毅然辞去了电报生的职务,一心扑到了戏剧工作上。

二

1933年,瞿白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部分时间仍活动在上海。当时他的周围已汇集了許多同志和朋友,这些人经济条件都很差,生活清苦,往往既无固定职业,又没有合适的住处,正式排戏、演戏时,非得临时租借电影院或剧场,平时需要开会或进行集体活动,只得采取游击方式,极为不便。这时,瞿白音为大家找到了旧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689号。那里交通便利,环境幽静,又安全,不易引起反动势力注意。

原来瞿白音的舅父王性有位大女婿,姓秦,嘉定人,比瞿白音年长十岁,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过几年书。此人思想开明,很早即向往于栽桑育蚕,提高农作物产量等理想,曾在浦东杨思桥地区办了一所东大农场,尝试种植一批来自法国的蔬菜。其后蔬菜陆续成活,收获颇丰,因而秦友鹤又在霞飞路689号租下了一套三层楼的店面房屋,底层作为东大农场的门市部,楼上两层的四五间房子,最初由秦友鹤本人及其来沪求学的子女居住,及至全家都从嘉定迁移来沪,另找了寓所,霞飞路689号住的人便很少了。

瞿白音发现了这个情况,自己便首先搬了进去,接着又说服秦友鹤,干脆将三楼的一大间转租给他们所办的业余剧社(在经济上支持这个剧社的据说是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张善琨几个人)。作为单身宿舍,于是王为一、田鲁等人便陆续迁入。二楼的大间则由白音介绍租给赵丹和叶露茜夫妇,后面的小间住的是单身的袁牧之。其他的影剧界人士如郑君里、王晨、唐纳、章泯、

章曼苹、吴茵等都以朋友身份,络绎不绝地在霞飞路689号出入,这里俨然成为当时上海进步剧人的大本营。有人记得当时正在复旦求学的冯女士,也曾使用这个地方,为曹禺名剧《日出》的上演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初排在内。

三

1937年,武汉、广州一线沦陷后,瞿白音曾和少数同志去过成都,搞了一些翻译工作。他到达桂林是1941年的冬天。

桂林新中国剧社是在1941年10月初组成的,社长李文钊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党则派出了田汉、杜宣等同志在业务上给予支持。剧社成立后就演出了陈白尘编创的《大地回春》和杜宣编剧的《南山之什》等,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配合,在后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演剧热潮。可由于在经营上管理无方,以及发生工作人员卷款潜逃事件,使经济陷入了困境,李文钊以无力续办离去。此时,瞿白音到了桂林,他导演了田汉的《秋声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因此剧社影响日益扩大,开始走向稳定。

1942年,剧社计划演出夏衍、洪深、田汉三位名家合作编写的新戏《再会吧,香港》,但由于作品尖锐揭露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祸国殃民的罪行,被一再禁演。后经抗争,虽被迫改名《风雨同舟》,一经与观众见面,效果很好(导演为洪深)。这期间杜宣曾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剧社前一阶段的工作。周恩来指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并拨款济助,于是剧社准备已久的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才得到隆重演出。瞿白音在内行中大受赞赏,此剧被誉为“磨光”之作。

(连载上)



□ 曾正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有效抗击日寇和惩罚汉奸,中共甘青特委决定:在甘肃靖远成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组建工作由王儒林全权负责。

王儒林(1906—1993),靖远县糜滩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交际处长、农业厅林业处长、民革甘肃省委委员、省政协常委等职。1932年5月,配合谢子长参加了靖远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在靖远县水泉堡参加了谢子长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遭到数次联合进攻。最后,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王儒林也转道宁夏。

1933年3月,王儒林遵照中共甘青特委指示,以“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身份在靖远北湾一带招收新兵。消息一经传出,散落在靖远、皋兰、榆中等地的原陕甘游击队员纷纷起来,曾与游击队有过联系的薛宝山、张子明等人也率众投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400人。

1933年3月中旬,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榆中县园子岔宣告成立。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孙作寅以特委军委书记身份参加组织领导工作。创立之初,义勇军编制为1个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吕振华、孙绍堂、王丕荣分别任一、二、三中队队长,吕明成、常焕章、宋占奎分别任副队长。

西北抗日义勇军之所以要将指挥部设在园子岔,就是因为园子岔地处靖、榆、皋三不管地带。义勇军成立后,一边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边号召农民踊跃参加义勇军。此外,义勇军还邀请著名篆刻家陈鼎用先生篆刻了“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印章。

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为解决农民的籽种和春荒问题,义勇军惩治了两个大土豪,并将百余石粮食分与农民。消息传出后,远在靖远平堡、北湾、蒋滩等地的农民纷纷响应。一时间,西北抗日义勇军名声大震。

3月底,兰州水北门在贺晋年的带领下发动了起义。起义成功后,贺晋年率部与王儒林率领的义勇军汇合。从此,义勇军增编了1个大队,贺晋年任大队长。随后,义勇军转移于皋兰北山红砂岷(今白银区武川乡)一带休整。4月下旬的一天,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在红砂岷开会,突遭甘、宁、青三省骑兵的包围。几日前,马步青驻永登马二虎所部黑马队、马鸿宾三十五师治成章骑兵旅一部、兰州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之袁福昌团、绥靖公署张绍武骑兵连以及驻靖远李贵清管等约5000余骑兵,从四面八方围拢红砂岷。情急之下,总指挥王儒林率十余人在前山阻击,孙作寅率主力退守后山。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因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王儒林、孙作寅等人不幸被俘。战斗中,贺晋年和吕明成带领60余人成功突围,参谋长张子明和三中队队长王丕荣各率百余名战士从不同方向冲出了红砂岷。

贺晋年和吕明成等人突围后,因不熟悉地形,就藏在红柳沟窑洞中靠挖野菜充饥。两天后,他们突遭治成章骑兵旅的袭击。吕明成枪法精准,手举双枪打死了不少敌兵。然而,敌人见状后就集中火力对付他,吕明成不幸身负重伤。负伤的他仍率义勇军战士顽强抵抗,最后壮烈牺牲,而贺晋年等4人不幸被俘。

王丕荣、宋占奎率众突围后,退至今白银区王砚镇灰土涝池不幸遭遇马二虎黑马队。因弹尽粮绝,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王丕荣受伤落马,敌人以为他已经阵亡,便扬长而去。后经群众救治,王丕荣才得以脱险,其余人全部牺牲。

为了营救被俘的义勇军官兵,张子明及杨得胜率众赶往皋兰后长川,途中遭到马二虎黑马队和治成章旅的联合夹击。子弹打完后,他们端起刺刀冲向敌人,刺刀折弯了就用枪托还击。除张子明、杨得胜等个别同志脱险外,其余同志均壮烈牺牲。国民党军队担心被俘的义勇军战士会逃跑,便用绳子将他们串在一起。随后,他们将总指挥王儒林等35人一起押往兰州。在途经后长川时,在战友的巧妙掩护下,王儒林得以脱险。抵达兰州后,孙作寅和李慕愚在中共甘青特委的多方营救下获释,而吕振华等人均在兰州英勇就义。

1993年4月6日,遵照王儒林的遗嘱,家属将其部分骨灰撒在了武川红砂岷,以陪伴长眠于此的战友。红砂岷一战,义勇军虽然遭受了灭顶之灾,但他们浴血奋战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向前。时至今日,红砂岷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文史工作者来这里缅怀先烈。这场血战,不仅展现了义勇军战士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且为甘肃的革命斗争史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

凝结抗战精神的抗大毕业证章



抗大第一期毕业证章,圆形,铜质,镶嵌玻璃漆。证章正面为黄底,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将证章分为数个区间,从右至左分别篆刻“团结”“活泼”“严肃”“紧张”及“毕业证章”等繁体字,五角星中部篆刻“抗大”二字,下方刻阿拉伯数字“1”,即第一期。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追溯其前身,最早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国红军学校,培养红军军政干部。1933年,根据红军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国红军学校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大学改称干部团,随部队踏上长征的征途。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红军干部团与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摒弃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1月,西北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教育长。第一期学员1000余人,全部来自红军各部,分为三科,其中一科38人,大多是红军中的师、团以上中、高级干部,罗荣桓兼一科政委,既是学员,又是领导干部;二科约200人,三科800余人。毛泽东、张闻天、周



恩来等领导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抗大学制不一,从四个月到半年、八个月、一年、三年多不等,主要根据当时情况而定,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制只有半年左右,第八期时间最长,为期三年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指示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于当年8月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在第二期的学员毕业证书上,有毛泽东亲笔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整个抗战期间,战争环境艰苦复杂,抗大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办学,总校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39年7月曾由延安迁往晋东南根据地,三分校则留在陕北。1943年1月,抗大总校迁回陕甘宁边区,由徐向前出任校长。除了抗大总校,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各大抗日根据地还相继建立了12所抗大分校,一般都是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为各个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培

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另有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1938年至1945年,抗大总校共招收了八期学员,加上各分校,共培训军政干部10万余人,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1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为鼓励更多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走进抗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挥毫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抗大创办后,精心设计了校徽、校旗和凯丰作词、吕冀作曲的校歌。1937年春,抗大第二期开学,鉴于学员数量增加和学校扩大的新情况,中央军委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他十分重视抗大的教育和建设工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校训还被写进《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抗战胜利后,抗大于1945年底迁往东北,改称东北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完成其光荣、神圣的历史使命。

这枚毕业证章是抗大颁发给第一期学员的毕业证章,品相完好,虽历经八十多年风雨沧桑,仍然令人瞩目。尤其是上面篆刻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抗大校训,让人领略到抗大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侮而英勇奋战所凝结的抗战精神。

□ 李至清



·甘肃人物·

张澍讲学 兰州书院

□ 柴冬茂

张澍,字伯瀚,号介侯,清代凉州府武威县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因性格“刚介特立,论事屹然,不唯不阿”,仕途颇为不顺,仅担任知县三十年。张澍在经学、史学、姓氏学、辑佚学、金石学等方面均卓有建树,辑有《西斋丛书》等,“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梁启超曾赞曰:“甘肃与中原隔绝,文化自昔朴儻,然乾嘉间亦有一第二流之学者,曰武威张介侯。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

嘉庆十二年(1807年)秋,张澍结束了漫游大江南北的生活,准备返回家乡。在进入甘肃境内后,他接到了宁夏道员积即阿和藩台蔡廷衡的文书,说是陕甘总督张龄聘请他到兰州书院任院长。这个消息对于陷入生活窘境中的张澍来说真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兰州书院讲学,他不仅可获得“每月修脯金四百金,每月薪水八两”,而且还能与一些文人士子、官员们保持来往,并有可能通过总督张龄的举荐再度出任。

兰州书院初名正业书院,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由甘肃巡抚卢询捐赀廉银,在明代肃亲王朱

亮修建的红花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甘肃巡抚许容又奉旨改建为兰州书院。兰州书院是中晚清时期甘肃规模最为宏大的官方书院,由南到北,按中轴线对称建有大门、仪门、文仁堂、敬逊堂、射圃等。在文仁堂和敬逊堂中间西面修建有数间房屋,是山长的住宅、客厅和斋房。张澍到兰州书院后就住在这里。

在兰州书院,张澍发现书院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学员们仅仅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用的“时艺”,却不去研读儒家经典和史学方面的书籍。张澍便在教学中除诗赋、书法外,又增加经学、史学等内容,极力倡导读经学史。如曾受学于张澍的安定县人马疏(字经纬,号南园,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陕西府谷、维南、富平、咸宁等县知县)说:“介侯师主讲兰山,疏从之学。师训及门,以经史为宗,词章次之。”

张澍的教学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士子们的应试能力,这也使得后任的山长们都沿用张澍设置的教学内容进行讲授,即由山长讲授经史名篇,与学生严格按照山长制定的计划攻读经史著作相结合。

兰州书院以藏书之丰富名冠陇右。讲学之余,张澍沉浸于典籍之中,饱读了书院皮藏的200多种经史子集,并开始研究凉州史地,编纂完成了《五凉旧闻》40卷。这一时期,张澍还与当朝显宦严烺、那彦成、铁保、松筠等人保持密切来往。松筠是张澍当年中进士之时在京城的老相识,两人性格颇合,相交深厚,嘉庆十三年(1808年)冬由伊犁将军调任陕甘总督。张澍曾作《上松湘浦(筠)制军》等诗,称赞他对儒学的重视,其中“微名久辱上公知,拂袖归来感岁时”“担心未信人能铸,善善宁教士不羁”“况荷崇擢宽礼数,秦风爰赋修裳诗”等诗句则表达对松筠当年赏识自己的感谢,同时也讲述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得到关照。后来,张澍作《纪松湘浦制府遗事》,详细记录了两人在兰州的交往:“抵任之日,(松筠)即来书院,握手曰‘君甲寅乡荐,余即知之,曾有诗寄章桐门,君见之乎?’余曰:‘荷公厚褒,未尝遗忘。’后每逢课期,必亲至,竟日乃去……”

不知不觉,张澍在兰州书院讲学已整整一年。秋天的兰州层林尽染,风景如画,在嘉庆十三年秋

日的一天,张澍邀请朱庭楷、朱庭模兄弟和杨本俊、刘自钦到五泉山赏秋景。游玩后,张澍作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秋入金天爽气侵,扞萝附葛上危岑。黄河东去淘豪杰,白塔西回厌梵林。怪石依稀岩虎踞,飞泉挂壁老龙吟。穀弓卜得茅亭筑,乘夜来弹舜帝琴。”描绘了兰州迷人的秋景。

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明节次日,张澍又一次登临五泉山,至清晖阁,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到书院。清明已过,陇原大地亦是一派春意盎然,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人们纷纷外出踏青。张澍也约几位好友或到黄河岸边,或登山踏青。一天,天气晴好,张澍便邀请朋友李彪、谈士涛同游兰山,怎知到半山腰时,春雷乍响,下起了沥沥春雨,三人只好下山返回。

嘉庆十五年(1810年)暮春的一天,张澍向新任的陕甘总督那彦成递上辞去兰州书院院长的书函,遂后再次踏上了回乡的路。张澍在兰州书院主讲2年有余,这是他人生中一段较为平静的舌耕读书生活,也是他开始关注和研究凉州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